

清代廣州十三行夷館題材外銷玻璃畫年代考

A Chro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Qing Dynasty Export Reverse Glass Paintings Depicting the Thirteen Hongs of Canton

鄭靈子

Zheng, Ling-Zi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

摘要

玻璃畫作為十八、十九世紀廣州外銷畫的一個重要畫種，以其獨特的美感和精湛的製作工藝深受西方市場的喜愛。由於商品畫的特殊性質，現存的廣州外銷玻璃畫極少有畫家簽名的作品，畫作的生產時間也由於可佐證文字資料的缺乏而難以界定。風景題材作為廣州外銷玻璃畫的一個重要類型，除為觀者提供審美價值外，對景觀的紀實性描繪也為探究作品年代提供了重要參考。以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為主題的外銷玻璃畫為例，畫家們忠實地再現了商館建築、旗幟的分布以及街道景象。通過觀察這些旗幟和街道的變遷，我們可以大致推測畫作所描繪場景的時代，從而為作品的年代判斷提供支持。

因此，本文將通過探析 18 世紀各國進入中國貿易的歷史背景及其在十三行建立夷館的時間，結合 18 至 19 世紀各國國旗的變化以及 1822 年大火後街道及夷館外觀的改變，分別對 6 件以廣州十三行夷館為題材的外銷玻璃畫的創作年代進行分析。試探究這 6 件玻璃畫生產的大致年代。並以這六件玻璃畫作品為例，討論廣州紀實性風景題材外銷玻璃畫與文字歷史資料之間的互文關係。

【關鍵詞】外銷畫，玻璃畫，廣州十三行，十三行夷館，年代

一、前言

十八世紀，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國熱」，中國的工藝美術品如漆器、瓷器等，成為十分熱門的外銷產品。隨著來華的外國人的日益增多，具有中國風格或描繪中國風物的貿易畫應運而生。自十八世紀中後期起，廣州十三行逐漸發展成外銷畫的生產和交易中心，專營外銷畫的店舖陸續出現。至十九世紀初，在十三行一帶已經有近三十家左右這類畫店。¹ 這些畫舖的經營範圍，囊括了玻璃畫、布面油畫、象牙鑲嵌畫等。其中，廣州外銷玻璃畫作為布面油畫的先聲，在十八世紀末遠銷海外，是十八世紀末最具代表性的外銷畫種之一。

玻璃畫（Glass painting），又稱玻璃油畫（Oil painting on glass）、玻璃背畫（Back painting）、反筆玻璃畫（Reverse glass painting）及鏡子畫（Reverse mirror paintings）等，指的是利用玻璃的透明性，在其背面以油彩或水粉等材料繪製圖像的一種藝術形式。玻璃畫的起源可追溯至十五世紀義大利的天主教聖像畫，13世紀隨著威尼斯玻璃製造業的興起，平板玻璃開始流行，並出現了小型便於攜帶傳播的玻璃聖像。² 14、15世紀，威尼斯的穆拉諾島壟斷了其共和國境內的玻璃製造業，成為歐洲七彩玻璃的生產中心。³ 1688年，法國發明了玻璃鑄造法，這種方法能夠生產出尺寸更大（長度可達兩米）的平板玻璃。⁴ 這些大片的平板玻璃生產成本十分高昂，通常在鍍銀後用於製作鏡子，成為皇室及上流社會社交圈常用的禮品。17世紀，這些大鏡子上便有繪畫的出現，尤其流行於德國與荷蘭。⁵ 由於其繪製技法相對複雜，至十八世紀已不在歐洲流行。⁶ 十八世紀中期，玻

¹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Princeton : The Pyne Press, Princeton), 51,54.

² Emily Byrne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Diplomatic, Mercantile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7),p.51.

³ Emily Byrne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Diplomatic, Mercantile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p.51.

⁴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2020),p.24.

⁵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p.24.

璃畫在中國重新興起，並主要在宮廷與廣州兩地生產。宮廷製作的玻璃畫通常以插屏、掛屏或鐘錶裝飾等形式呈現，作為宮廷內部陳設或裝飾材料。而廣州生產的玻璃畫則多以肖像畫及裝飾畫形式遠銷海外，深受西方市場的青睞。

廣州外銷玻璃畫風格題材多樣，大致可分為風景題材、場景人物、肖像人物、花鳥題材四類。其中風景題材作為廣州外銷玻璃畫重要的題材之一，描繪的內容主要集在廣州當地的自然景觀和城市風貌。這些畫作通常採用寫實的藝術手法，忠實地再現了 18 至 19 世紀廣州的地理景觀及社會環境。畫家們細緻入微地描繪出當時的街道、河流、建築物以及夷館區等標誌性場景，通過逼真的構圖和精確的色彩表現，將當時的廣州風貌具體而生動地展現在畫面中。這些風景畫作不僅具備高度的審美價值，還作為重要的歷史資料，成為西方觀者及後世研究者了解 18 世紀廣州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風貌的重要途徑。

由於廣州外銷玻璃畫商品畫的特殊性質，其詳細的生產檔案或交易記錄較為稀少，研究者很難通過文字資料確定畫作的年代，僅有少數能夠依賴其他形式的證據，如購買合同、海關記錄、以及相關歷史背景資料進行推測。圖像方面，風景題材的廣州外銷玻璃畫通過寫實的手法展現當地的風貌，使觀者能夠在欣賞畫作的同時，獲取有關當時地理環境、建築結構及社會生活的具體信息，如在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的場景時，畫家忠實呈現了夷館前的旗幟、街道和建築等細節，這些視覺元素為研究者探究畫作的繪製時間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依據。

因此，本文將從 18 世紀各國進入中國貿易市場的歷史背景出發，結合各國在廣州十三行建立商館的具體時間點，對比 18 至 19 世紀各國國旗樣式的變遷，以及 1822 年廣州十三行大火後街道佈局和夷館外觀的變化，對 6 件外銷玻璃畫的創作時間進行分析。通過這些視覺和歷史元素的交叉研究，本文將試圖探究每件作品所描繪的年代，並探討在地景觀、歷史圖像以及文字資料三者之間的互文關係。

⁶ 江滢河，〈清代廣州外銷畫的創作形式與題材〉，《文化雜誌》，卷 44（2002 年），頁 168。

二、廣州十三行夷館區與街道變化

廣州自古就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番禺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⁷，呂思勉指出：「此語非指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廣者矣。」⁸ 可見廣州的外貿易活動至少可追溯至漢武帝時期。南朝時期，廣東逐漸取代中原地區，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並持續至鴉片戰爭前，歷時 1400 多年。⁹

18 至 19 世紀，清政府實施嚴格的海禁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由於英國商人洪任輝在寧定海擾亂事件，清政府下令撤銷漳州、寧波和雲台山（今連雲港附近）三處貿易口岸，僅廣州口岸延續對外貿易往來，從此開啟了廣州「一口通商」的時代。¹⁰ 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廣州進一步成為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正如屈大均詩中所述，「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¹¹。詩中描繪的場景反映了廣州，尤其是廣州十三行在此時期的繁榮與富庶，展現出廣州十三行作為中外貿易樞紐的輝煌局面。

清代廣州的海外貿易主要依賴於十三行的行商體系。清朝規定外商來中國貿易必須通過十三行買賣貨物，而不得直接與其他中國商人進行交易。根據行商貿易的地區不同，十三行主要分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種類型，其中，外洋行主要負責辦理各國商人來粵貿易事務。¹² 十三行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質，其主要職能是作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間的中介和經紀人，既代表外商進行貿易，又受清政府委託監管外商在廣東的經貿活動。十三行的行商不僅經銷進口洋貨，還經營出口土貨，並代外商向粵海關繳納關稅規銀。此外，十三行設有「十三行夷館」，提供外商住宿、商務辦理和貨物存放等服務。

⁷ 徐德志等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

⁸ 徐德志等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頁 3。

⁹ 徐德志等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頁 3。

¹⁰ 顧潤清等，《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17。

¹¹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51 頁。

¹² 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51 頁。

十三行夷館區位於廣州城西南的太平門外，地屬西關地區。其範圍東至西濠，南臨珠江，西至聯興街，北界以十三行街為界。區內有三條主要的南北走向商業街道：西側為同文街（亦稱新瓷器街，New China Street），中央為靖遠街（亦稱舊瓷器街，China Street），東側則為豬巷（後稱新豆欄街，Hog Lane）。這些街道上，行商設立的外洋行和專為西方商人提供衣帽及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商店林立。十三行夷館區的碼頭臨珠江而建，為外國商人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樞紐，周邊匯聚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商和各類商販，成為 18、19 世紀廣州口岸獨具特色的商業中心與國際貿易景觀。¹³

十三行夷館幾乎呈一字型排列在珠江左岸，早期為中式建築，至 18 世紀五六十年代其外觀才逐漸改成西方風格。¹⁴ 外國商人在支付了大筆款項後，中國政府允許他們以自己的風格設計和建造夷館的外部建築，儘管內部仍必須保留中國傳統風格。每座夷館的門房前都會懸掛該國的國旗，然而，這些國旗並不象徵該國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或外交尊嚴，而僅僅是用來區分不同國家夷館的標誌。¹⁵ 華麗的西方建築風格在此時期逐漸成為廣州十三行夷館區的一大特色，其裝飾精美的門面不僅展示了當時西方列強在華勢力的擴張，也成為外界了解中國對外貿易活動的一個「櫥窗」。¹⁶

表一歸納了 1823 年以前廣州十三行商館的分布。由該表可見，十三行街區以外國商館為主，中間混雜著中國商行。1823 年以前，廣州十三行街區自西向東分別分佈了黃旗行（丹麥）、同孚行、呂宋行（西班牙）、舊公行（法國）、東生行、燕子巢、新街、廣源行（美國）、萬源行、寶順行、孖鷹行、瑞行（瑞典）、隆順行（英國）、豐泰行、豆欄街、保和行（英國）、集義行（荷蘭）、義和行、行後關口。18 世紀以來，丹麥、瑞典、英國、法國等國家先後與清政

¹³（美）馬士撰，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年），第 56 頁。

¹⁴（英）孔佩特撰，於毅譯，《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35。

¹⁵ 耿昇，〈17-18 世紀在廣州的法國商人、外交官與十三行行商〉，《暨南史學》，（2014 年），頁 226。

¹⁶ 耿昇，〈17-18 世紀在廣州的法國商人、外交官與十三行行商〉，頁 213。

府建立貿易關係並在廣州十三行建立商館，在清政府的准許下，各國在商館外樹立起國旗，標誌其國家身份。

表一 1823 年以前的歐洲商館分布表¹⁷

排序 (自西 向東)	國家	商行名稱
1	丹麥	黃旗行 Wong-he Hong “The yellow flag factory”_the Danish factory
2	中國	同孚行 Tung-foo Hong “The factory of mutual trust”—occupied by a Hong merchant.
3	西班牙	呂宋行 Luy-sung Hong “The Luzon factory”i.e.the Spanish factory.
4	法國	舊公行 Kaw-kung Hong “The old public hong”—the French factory.
5	中國	東生行 Tung-sang Hong “The factory produced in the east”—occupied by a Hong merchant.
6	中國	燕子巢 Een-ze Chaou, “The swallow's nest”—the corner factory.
街道		新街 Sun-kae. Here is a street,containing shops,where Europeans make their various small purchases,intervenes,called“China-street”,sometimes New China-street,in contradistinction from a street that runs at rightangles to this one,and which is called“Old China-street”.The Chinese call it
7	美國	廣源行 Kwong-yune Hong “The factory of wide fountains”—the American factory.
8	中國	萬源行 Man-yune Hong “The factory of ten thousand fountains”.
9	中國	寶順行 Pow-shun Hong “The precious prosperous factory”.
10	中國	孖鷹行 Ma-ying Hong “The twin eagle factory”—the Imperial factory.
11	瑞士	瑞行 Suy Hong “The Swedish factory”,for Swede,the Canton people say“Suy”.
12	英國 (舊)	隆順行 Lung-shun Hong “The gloriously prosperous factory”—the old English factory.
13	中國	豐泰行 Fung-taie Hong “Affluent great factory”,called the“Chow-chow”factory
街道		豆栏街 Tow-lan-kae. intimating that it is occupied by a variety of persons—Parees,Moormen,&c.Next to this factory [Pow-wo Hong]there is a narrow loane,with small ships on one side,where seamen procure clothes,spirits,&c.called,by Europeans “Hog-ane”;by theChinese

¹⁷ 轉自范岱克：〈1760-1843 年外國人居住區的商業街〉，文字資料來自馬士，馬士只紀錄了 16 個商館，事實上碼頭附近這些資料的蒐集於 1822 年十三行大火前完成，18 共有 17 個商館，1815 年，標號 14、15 合併後才成為 16 個。22 年大火後，十三行商館只剩 13 個。

14-15	英國	保和行 Pow-wo Hong “The factory that ensures tranquility”—the English factory.
16	荷蘭	集義行 Tseep-ee-Hong “Assembled righteousnesses factory”—the Dutch factory.
17	中國	義和行 E-wo Hong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factory”, commonly called the Creek factory.
街道		Mandarin House, 行后关口 Hong-how-kwan-how.

廣州十三行的街道與建築並非一成不變。1822 年和 1856 年，廣州十三行先後經歷了兩次大火，建築與街道也因此發生了變化。范岱克（Pual A. Van Dyke）在〈1760-1843 年廣州外國人居住的商業街〉一文中指出，1760 年至 1822 年間，靖遠街和豬巷已經存在，而 1822 年火災之後，又建了一條「新瓷器街」。¹⁸「新瓷器街」位於丹麥行的東側，如圖 2 所示。在 1822 年火災之前，圖 1 中的建築 1 和 2 之間就存在一個通道，而在 1822 年的大火將十三行商館區幾乎夷為平地之後，這片區域開始重建，「新瓷器街」建成後，原本位於建築 1、2 之間的通道也拓寬了許多（如圖 2）。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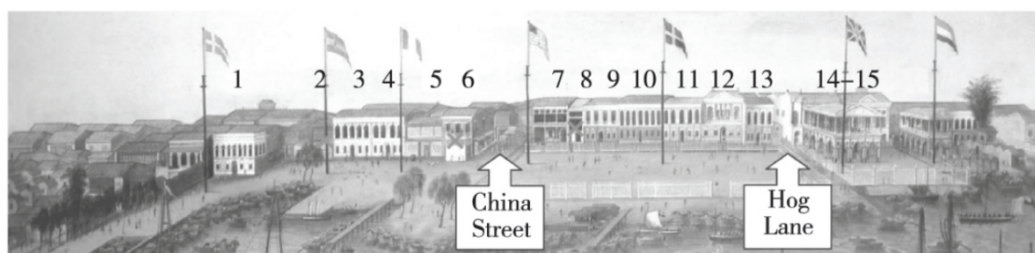


圖 1 〈18 世紀末十三商館分布圖〉



圖 2 〈1822 年火災後十三商館分布圖〉

通過 1822 年前後十三行街道的變化，我們可以將描繪十三行夷館區的玻璃畫大致分為 1822 年前及 1822 年後的作品。根據筆者所蒐集的以十三行夷館為題材的外銷玻璃畫圖片，尚未發現能夠清晰地看到新中國街的玻璃畫作品。而在〈十

¹⁸ 范岱克，任希嬌，〈1760-1843 年廣州外國人居住的商業街〉，《海洋史研究》，（2015 年 02 期），頁 106。

¹⁹ 范岱克，任希嬌，〈1760-1843 年廣州外國人居住的商業街〉，頁 108。

三行夷館一〉（圖 3）、〈十三行夷館二〉（圖 4）、〈十三行夷館三〉（圖 5）、〈十三行夷館一〉（圖 6）中，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新瓷器街還未建成，丹麥館東側只有一小小的通道，可見這幾件作品描繪的是 1760 至 1822 年之間的場景。

三、廣州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之年代探討

由於各國開展對華貿易的時間不一，且受政治變遷等因素影響，不同時期十三行夷館的數量及分佈並非固定不變。通過分析各國在十三行建立商館的時間，並結合同時期夷館前國旗排列的變化，本文將探索外銷玻璃畫的創作年代，以期為推測其繪製的時代背景作為參考。

如圖 3、圖 4 中兩件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以及珠江風景的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畫家對夷館、船隻等都進行了精細的描繪，在構圖、繪製方法上也十分接近，只是在視角與色調上稍有差別。這兩件玻璃畫中，夷館前的旗幟排列的順序與夷館外觀表現幾乎完全一致，略為不同的是〈十三行夷館二〉中商館圍著一圈圍欄，而這些圍欄在〈十三行夷館一〉中並未呈現。據亨特《廣東番鬼錄》記載：「直到 1822 年的火災為止，這個廣場一直是「番鬼」們專用的，周圍用欄杆圍了起來。但是後來，堅固的欄杆被毀壞了，中國人常把廣場當作通衢大道……」²⁰ 根據亨特的描述，在 1822 年火災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十三行夷館廣場前的圍欄應該是長期存在的，但在 1822 年前不同時期的外銷玻璃畫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沒有繪製圍欄的作品（如圖 5、圖 7），或許在亨特並未提及的歷史間隙，這些欄杆曾被拆除重建，而廣州外銷畫家們則通過玻璃畫細膩寫實的描繪，向觀者訴說著歷史的流動。

²⁰（英）亨特，馮鐵樹，沈正邦譯，《中國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頁 207。



圖3〈十三行夷館一〉，玻璃油畫，
40 x 35 cm，哥德堡城市博物館



圖4〈十三行夷館二〉，玻璃油畫，33.7 x 49.5 cm.
馬丁格雷戈里畫廊

在這兩件作品中，我們從左到右分別可以看到丹麥、法國、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瑞典、英國、荷蘭的國旗。其中，在這兩件玻璃畫中的法國國旗為君主制時期的白旗、英國國旗樣式為愛爾蘭合併前所使用的紅十字（聖喬治十字）與「X」形十字（聖安德魯十字）相結合的旗幟，這些特殊的旗幟樣式可以作為分析玻璃畫所描繪時間的錨點。此外，由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雙鷹旗在中國出現的時間較短，因而也是判斷玻璃畫時間的重要參考。

神聖羅馬帝國始於公元 962 年，其年東法蘭克國王奧托一世(Otto I, 912-973) 由教皇加冕為「羅馬皇帝」，正式建立了神聖羅馬帝國，其領土以今德國、奧地利為中心。18 世紀，由於普魯士王國的崛起，奧地利大公國與普魯士王國在西利西亞(Schlesien) 等地區爭奪，導致帝國的權利逐漸被奧、普兩國瓜分。神聖羅馬帝國並無現代意義上的國旗，但常用雙頭黑鷹旗幟代表皇權。如圖所示，雙頭黑鷹頭戴皇冠，一爪持權杖與寶劍，一爪擒著象徵帝國的寶球，鷹身中間裝飾著象徵著奧地利的紅白紋章盾。



圖 5〈神聖羅馬帝國旗幟〉

儘管奧地利帝國的旗幟在廣州只懸掛了短短幾年時間，但奧地利帝國租用過的商館保留「帝國行」的名字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從 18 世紀 20 年代旗，奧斯坦德洋行曾將掛著「孖鷹旗」的英國商船送至中國，首次是 1779 年，末次是 1787 年。²¹

據廣州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商館玻璃畫一〉、〈十三行商館玻璃畫二〉對雙鷹旗的描繪²²，可推測這兩件作品描繪的是 1779 年至 1787 年之間的場景。

此外，對比〈十三行商館玻璃畫一〉、〈十三行商館玻璃畫二〉〈十三行夷館三〉（圖 3.2.7）三件玻璃畫中的法國國旗，可以發現儘管這三件作品中的法

²¹（英）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54。

²²（英）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54。根據孔佩特書中的描述，圖 4 中法國白旗右側為帝國館的雙鷹旗。圖 3 由哥德堡城市博物館提供，由於該館正在搬遷無法提供更為清晰的圖片，但根據該圖依稀可以看到與圖 4 相同，雙鷹旗位於法國白旗右側。

國國旗皆為白旗，但〈十三行夷館三〉中的法國國旗位置明顯向西偏移，這與 1782 年法國商館西遷的歷史相關。



圖 6 〈十三行夷館三〉玻璃油畫，52.5 x 81 cm，阿姆斯特丹國家文化博物館

法國在廣州設立商館的歷史可追溯至 1715 年。²³ 但直到 1776 年，法國國旗才開始在商館前升起。1776 年，法國新國王路易十六將廣州的法國商館改為「領事館」，並由沃克蘭（Pierre Vauquelin, ?-1782）擔任領事，²⁴ 清政府對此舉的其中一條規定是：「法蘭西的國旗必須懸掛在領事住所處」。²⁵

法國人長期租用的商館是歐洲人所能租到的最寬敞舒適的商館之一，1782 年，法國領事沃克蘭去世，繼任的法國領事無意償還商館租金，法國人只能遷至偏西一處十分破敗的洋行。直到 1791 年，法國人才再次回到「寬敞的法蘭西商館」，並於 1791 年 10 月 18 日，第一次升起了新的國旗，²⁶ 學者孔佩特認為，這面新的國旗可能是 18 世紀 90 年代初法國大革命後期所使用的過渡式的國旗（左上角有紅藍白圖形的白旗），因為 1794 年後，法國著名的三色旗才被法國國會承認。²⁷ 而在 1791 年之前，法國所使用的是君主制的白旗。1796 年，「法國皇家代理」兼廣州代理領事克雷蒂安·路易斯·德經（Chrétien-Louis-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離開廣州，在他離開中國後的 18 世紀 90 年代末，十三行

²³ 蔡香玉，〈廣州十三行法語文獻略述〉，頁 387。

²⁴ 蔡香玉，〈廣州十三行法語文獻略述〉，頁 387。

²⁵ （英）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47。

²⁶ （美）馬士撰，區中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第二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年），頁 209。

²⁷ （英）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52。

前再也沒有升起法國國旗。1803 年至 1804 年間，法國的三色旗在廣州短暫出現後，在十三行整整消失 30 年，²⁸ 直到 1832 年，法國的三色旗在廣州重新掛起。²⁹〈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兩件玻璃畫中的白色旗幟，正是法國 1791 年之前所使用的君主制旗幟，且對比圖 3、圖 4、圖 6 三件夷館題材玻璃畫作品可以發現，圖 3、圖 4 中的法國旗幟位於靖遠街東側，圖 6 中的法國國旗則在靖遠街西側，可見〈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為 1782 年法國商館西遷之前的作品，結合帝國館前飄揚的雙鷹旗幟，可推測這兩件玻璃畫描繪的是 1779 年到 1782 年之間廣州十三行夷館區的場景。

在玻璃畫〈十三行夷館三〉（圖 6）中，外銷畫師採用偏暖的色調，天空由下方淡淡的粉橘色過渡到淺藍色，江面也由於天色的映照而泛著暖色的光影，夷館前還繪有往來的人群，江面上停靠著各式各樣的船隻，畫家描繪的可能是晨光或者黃昏的場景。相較於圖 3、圖 4，這件玻璃畫中多了西班牙國旗的身影，而帝國館前的旗幟卻消失了，法國的旗幟仍為白旗，其位置則向西遷移。

如前所述，1782 年法國領事沃克蘭去世後，由於無力償還商館租金，法國商館被迫西遷，直至 1791 年後才搬回原來的商館，結合雙鷹旗的消失，可推測這件作品所描繪的大約為 1787 年至 1791 年之間的場景。

康熙六十年（1721 年），首艘西班牙商船「平安聖母和聖沙勿略號」（*Nuestra Señora del Buen Viaje y San Francisco Xavier*）自馬尼拉抵達廣州黃埔，開啟了西班牙與廣州的首次貿易接觸，並在廣州建立了西班牙商館。然而，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西班牙船隻未再進入廣州。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西班牙商船重新駛入廣州，當時的西班牙商人暫時寄居於行商潘啟官的商行內。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部分西班牙商人開始從潘啟官的商行遷出，並租賃當地房屋自

²⁸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76.

²⁹ 王巨新，《清朝前朝涉外法律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頁 24。

行居住。³⁰ 然而，隨著西班牙外交官阿戈特（Agote）於 1787 年抵達廣州，他發現西班牙商人所租住的潘啟官舊屋已經破舊不堪，因此決定對其進行第一次大規模改建。據阿戈特日記記載：

商館的第一次改造工程於 1788 年 8 月完成，該次施工包括商館的第一層以及臨主街的立面，施工面積長 36 巴拉，款 14.5 巴拉。臨街立面改建為完全的歐式風格，使潘啟官的舊屋煥然一新。³¹

到 1788 年 8 月 24 日，西班牙商館的首次修繕工程完成，西班牙人在廣州正式建立了獨立的商館，並升起了西班牙國旗。³² 在第一次裝修後不久（1789 年 1 月），阿戈特又主持了第二次裝修，之後廣州的西班牙商人每年都住在這棟樓裏，直到 1822 年的大火將十三行商館區大部分建築燒毀。³³ 1823 年西班牙商館重建後，他們繼續居住在被稱之為「呂宋行」的商館內，一直持續到 1830 年代。³⁴ 在〈十三行夷館三〉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玻璃畫家對商館及商館前的旗幟細緻的描繪，西班牙館的外立面為典型的歐式風格，館前飄揚的旗幟也說明這件作品描繪的是 1788 年之後的場景。結合畫面中白色的法國君主制旗幟，可推測〈十三行夷館三〉描繪的是 1788 年至 1791 年之間的景象。

同樣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與珠江港口風光的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夷館四〉（圖 7）中，畫家採用飽和度更高的藍色來描繪天空和水面，相對〈十三行夷館三〉，畫家不僅用色彩渲染的方式表現天空，更用白色細膩地將雲層表現出來。這件玻璃畫中，丹麥、西班牙、瑞典、英國行以及荷蘭的商館排序與圖 6 類似，較為特

³⁰ 湯開建，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廣州商館日記》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貿易和廣州十三行史料〉，《清史研究》，（2024 年五月，第三期），頁 8。

³¹ Museo Marítimo Vasco: *Diario de Manuel de Agote*, R.631 (año 1789), pp. 92-93.

³² NAH: Canton 94, 1788.08.24; Museo Marítimo Vasco: *Diario de Manuel de Agote*, R.631 (año 1789), pp. 92-100.

³³ 湯開建，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廣州商館日記》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貿易和廣州十三行史料〉，頁 8，頁 9。

³⁴ Paul A. Van Dyke, *200 Years of Spanish Shipping in Canton and Macao (1640—1840)*, *Revista de Cultura*(international edition), N.69, 2022, pp. 79-111.

別的是法國的國旗不再出現在玻璃畫中，且畫面中多了美國國旗的身影。如前所述，1796 年至 1833 年期間，除 1803 年到 1804 年 法國三色旗短暫地出現在廣州，其他時間法國國旗一直處於缺席的狀態，因而這件作品的製作時間應該是在 1796 年之後。



圖 7〈十三行夷館四〉玻璃油畫，39.3 x 59.7 cm，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

值得注意的是，畫面中英國國旗與〈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十三行夷館三〉一樣，都採用紅十字（聖喬治十字）與「X」形十字（聖安德魯十字）相結合的旗幟。英國東印度公司自 17 世紀末開始活躍於中國貿易，1715 年隨著英國首次在廣州租賃行商房屋設立夷館，「在廣州設置了一個有固定員司的商館，並定期派遣船隻」。³⁵ 從 1720 年到 1801 年，英國在廣州所使用的國旗是紅十字（聖喬治十字）與「X」形十字（聖安德魯十字）相結合的旗幟（圖 8）。³⁶ 1801 年，英國合併了愛爾蘭，並選擇聖帕特里克十字（紅色 X 形十字）為愛爾蘭象徵加入原國旗之中，形成現在大家所熟悉的「米字旗」（圖 9）。³⁷〈十三行夷館四〉中的英國國旗所採用的為 1801 年之前的樣式，結合法國國旗的缺席，可推測這件玻璃畫作品描繪的是 1796 年至 1801 年之間的場景。

³⁵（美）馬士撰，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頁 56。

³⁶（英）A.茲納梅沃斯基撰，俞蘅譯，《旗幟插圖百科》（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07。

³⁷（英）A.茲納梅沃斯基撰，俞蘅譯，《旗幟插圖百科》，頁 40。



圖 8 〈1606 年前的英國國旗〉



圖 9 〈1606 年後的英國國旗〉

此外，這件玻璃畫中的美國國旗同樣值得注意。1784 年 2 月 22 日，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次抵達廣州。隨船的貨物押送員塞繆爾·尚恩 (Samuel Shaw) 在日記中記錄道：「中國皇后號」抵達黃埔幾天後，英方派遣官員特地前來，歡迎美國旗幟首次在中國出現。」³⁸。但在美國領事塞繆爾·斯諾 (Samuel Snow) 到達廣州前，美國人在十三行既沒有專用的商館，也沒有常駐廣州的領事。³⁹ 1799 年塞繆爾·斯諾抵達廣州，並向粵海關提出了在十三行懸掛美國國旗的請求：

（塞繆爾·斯諾）訪問霍爾並將他的委任書拿出給他看，他是有約翰·亞當斯 (John Adams) 總統於 1798 年五月簽署給國會，委派他為廣州口岸及鄰近地區的美利堅合眾國領事，已經通過行商將他的到任轉知海關監督並要求准許懸掛其國旗，此時立即照準。⁴⁰

從此，除了在局勢緊張和戰爭時期，美國國旗一直飄揚在十三行上空，直到 1856 年十三行徹底毀滅。⁴¹

美國國旗被稱為「星條旗」，15 世紀末，北美淪為英國殖民地，美國採用的旗幟是有 13 條紅白條紋，靠近旗桿的方形部分為「米」字形（圖 10），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同。1776 年 6 月 14 日的大陸會議決定將美國國旗改為帶 13 顆

³⁸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osiah Quincy, 1847, p.164

³⁹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osiah Quincy, 1847, p.164

⁴⁰ (美)馬士撰，區中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第二卷，頁 358。

⁴¹ 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53。

星的藍色國旗，之後便出現了兩種設計，一種是由貝茜·羅斯（Betsy Ross, 1752-1836）設計的星星成圓形的分布（圖 11）；另一種是弗朗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設計的，星星成交錯排列（圖 12）。⁴² 美國獨立後，由於加入聯邦的洲不斷增多，星條旗的設計開始有了改動，1818 年 4 月 4 日美國國會通過一個國旗修改法案，規定從此以後，國旗上五角星的數目應與合衆國國州的數目相等。凡加入聯邦的一個星州，就在次年 7 月 4 日獨立節時，為國旗增加一顆白星。⁴³



圖 10〈十五世紀末的美國國旗〉



圖 11〈貝茜·羅斯設計的美國國旗〉



圖 12〈弗朗西斯·霍普金斯設計的美國國旗〉

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夷館四〉中的美國國旗皆為 1776 年後霍普金斯設計的樣式應為 1799 年粵海關批准塞謬爾·斯諾的請求之後所作，結合前文的分析，〈十三行夷館玻璃畫四〉（圖）所描繪的歷史區間可縮短為 1799 年至 1801 年之間。

相較於〈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一〉、〈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二〉、〈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三〉、〈十三行夷館玻璃畫四〉這幾件外銷玻璃畫對十三行夷館風景以及建築物鉅細靡遺的細膩表現以及寧靜和諧的色彩表達，〈十三行夷館五〉（圖 13）、〈十三行夷館六〉（圖 14）的表現則較為簡略，畫師簡要的表現了十三行夷館區的建築物及其前方的旗幟，比例和透視上也不甚準確，顏色相較圖 7 等玻璃畫的簡淡寧靜顯得更加深沉，構圖也更為飽滿，留白較少。這兩件玻璃畫作並未如前述的玻璃畫一般對十三行夷館區進行全景式的描繪，而是截取部分進行繪製。〈十三行夷館六〉從左到右分別為法國的三色旗，美國、英國、丹麥的國旗；〈十三行夷館七〉從左到右分別為西班牙國旗，法國的三色旗，美國、英國、丹麥的國旗。其中，英國國旗採用的是 1801 年之後的樣式，而法國三色旗在中國使用的時間為 1803 至 1804 之間，或是 1833 年之後。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件玻璃畫中丹麥的國旗位置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從原本的最西側被放置到畫面

⁴² 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37。

⁴³（英）A.茲納梅沃斯基撰，俞蘅譯，《旗幟插圖百科》，頁 42。

東側，筆者目前並未找到丹麥館遷動的相關資料。據《中國番鬼錄》記載，丹麥人和瑞典人在 1825 年之前好些年就從廣州撤走了。以前由他們經營的商館卻一直沿用他們的名字。當時也沒有法國商人在廣州做生意。1802 年至 1832 年，這 30 年間一直沒有升起過法國的國旗，連人員也撤走了。1832 年 12 月 13 日，法國領事（1828 年任命的）熱爾內特（Gernaert）重新升起了國旗。⁴⁴ 圖 13、圖 14 畫面中丹麥國旗與法國三色旗同時出現的場景與亨特的記載相悖，但亦有可能是 1803 年至 1804 年法國國旗短暫重現廣州的場景，但鑑於丹麥館的位置以及畫面抽象的描繪，筆者更傾向於這兩件作品為 1833 年法國三色旗重現廣州之後的作品，而丹麥旗幟的出現可能是畫工謬誤。



圖 13 〈十三行夷館六〉，玻璃油畫，21.5 x 32.5 cm，蘇富比拍賣



圖 14 〈十三行夷館七〉，玻璃油畫，21.5 x 32.5 cm，蘇富比拍賣

綜上所述，通過對旗幟圖像的比對以及各國在十三行貿易的歷史，筆者認為〈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描繪的可能是 1779 至 1782 年之間的場景；〈十三行夷館三〉則可能為 1788 之 1791 之間；〈十三行夷館四〉所描繪

⁴⁴（英）亨特撰，馮鐵樹，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頁 35。

的則是 1799 至 1801 年之間十三行夷館的景象；〈十三行夷館五〉、〈十三行夷館六〉則可能為 1833 年之後所作。筆者所蒐集的六件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的外銷玻璃畫中，圖 3、圖 4、圖 6、圖 7 這四件玻璃畫在構圖、內容以及繪製的細緻程度更為相似，但在用色上及畫法上卻各有不同，由於筆者目前掌握的樣本量較小，難以通過畫作的風格特徵梳理其脈絡。但相較於圖 13、圖 14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兩件作品的表現手法明顯更為粗糙，畫師對建築物的描繪不再精確細緻，透視也不準確，因此可以推測這兩件玻璃畫可能是 19 世紀中期廣州外銷玻璃畫走向式微時期的作品。

四、景觀、歷史與圖像的互動性

美國學者保羅·亞當斯在《媒介與傳播地理學》中提到，外銷畫是一種「與地方、景觀、區域、路線等現象之間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互動的文本……與地理事實之間相互形構。」⁴⁵ 以廣州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夷館」題材為例，這一內容囊括珠江口岸、夷館建築、各國旗幟的景觀圖像，將特定的人群（來華洋人）、歷史節點（清朝一口通商時代）、與地景（廣州十三行）交織在一起，成為記錄清代廣州開埠文化的重要歷史見證。

廣州十三行作為 18、19 世紀來華洋人的主要活動地點，在歷史中作為廣州地區最重要的地理位置之一被反覆記載，如屈大均的《廣東新語》⁴⁶、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⁴⁷、章文欽的《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⁴⁸ 等著作。而紀實性的外銷玻璃畫作品，則與歷史文字資料互為補充，相互驗證。廣州外銷玻璃畫家透過自己的筆尖，一方面具象化地重現了廣州十三行昔日的盛況，另一方面也在填補了文字資料無法觸及的部分，如〈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二〉中夷館前廣場上欄杆的變化，這些細枝末節的改變時常被歷史的書寫者所忽略，但卻真切地表現在外銷玻璃畫中。此外，外銷畫家們對十三行夷館的描繪與文字

⁴⁵（美）保羅·亞當斯撰，袁艷譯，《媒介與傳播地理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120

⁴⁶（明）屈大均，《廣東新語》（上海：中華書局，1985 年）。

⁴⁷（清）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⁴⁸ 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 年）

資料相互佐證，如〈十三行夷館一〉、〈十三行夷館三〉、〈十三行夷館四〉，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建築樣貌，旗幟的排序的變化。而這些變化與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⁴⁹、《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⁵⁰，阿戈特的《廣州商館日記》⁵¹，亨特的《中國番鬼錄》⁵² 等文字資料相互印證，給予當代人更為深入、真切地了解 18、19 世紀廣州口岸的機會。

由此可見，在十三行夷館題材的廣州外銷玻璃畫中，地景、文字與圖像的之間是相互作用的。地景在這類作品中以第一主角的姿態被外銷畫家們描摹成圖，圖像則進一步豐富了景觀的內涵，反映特定歷史時間的人與地景之間的聯繫，正如 18、19 世紀的十三行夷館之於當時來華貿易的西方商人。十三行夷館為題材的廣州外銷玻璃畫多採用全景式的視角來描繪，將十三行夷館區的建築物，珠江上往來船隻貿易的景象鉅細靡遺地描繪出來，既體現了景觀在畫作中的首要地位，同時也表達了這一區域對 18、19 世紀遠航的西方人的重要紀念意義。而發生在這一地區的歷史事件則被歷史學家用文字記錄著，反過來用於詮釋圖像。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十三行夷館題材玻璃畫的描繪十分寫實，但我們不能忽略圖像中創作的部分，如廣州外銷玻璃畫〈十三行夷館五〉、〈十三行夷館六〉兩件玻璃畫對十三行簡化的描繪以及丹麥館位置的更變。廣州外銷玻璃畫作為 18、19 世紀中國遠銷海外的商品畫的一個重要畫種，時常有同一畫作被多次複製的情況出現，特別是到了 19 世紀外銷玻璃畫產業式微時，玻璃畫畫工開始變得粗糙，對建築物的描繪遠不如 18 世紀的作品細膩（如圖 13、14）。1856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廣州十三行由於英軍的侵略淪為一片瓦礫。⁵³ 從此以後，外銷畫家們僅能通過記憶及舊的畫稿在畫作中重現十三行當年的榮光。因此，儘管我們能夠通過十三行夷館題材玻璃畫畫面中的建築物、街道、旗幟來分析其描繪的場景的時間，但卻難以以此斷定其創作時間，需結合作品的風格、質量及材

⁴⁹（美）馬士撰，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⁵⁰（美）馬士撰，區中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第二卷

⁵¹ 湯開建，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廣州商館日記》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貿易和廣州十三行史料〉。

⁵²（英）亨特撰，馮鐵樹，沈正邦譯，《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

⁵³（英）孔佩特，《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頁 205。

料分析進一步探索。如圖 3、圖 4、圖 6、圖 7 這幾件玻璃畫，通過畫家描繪的精細程度可大致判斷這些作品應完成於廣州外銷玻璃畫最為盛行的 18 世紀中後期，結合其描繪的場景可判斷，作品的完成時間與其描繪的場景時間應相差不大。因此，儘管廣州外銷玻璃畫的創作時間相較於其所描繪的時間往往較為延後。但無論如何，就歷史圖像而言，這類題材的外銷玻璃畫仍具有重要的歷史參考意義。

除此之外，對於 18 世紀的歐洲人而言，十三行夷館題材的廣州外銷玻璃畫還承擔著打破歐洲與中國之間地理隔離的重要任務。赫德遜(G.F.Hudson)指出，中國和歐洲「是在地理相互隔絕的情況下發展和成熟起來的。」⁵⁴，這種隔絕是的歐洲關於中國的認識建立在假想的基礎上，一個全屬臆造的，出產絲、瓷和漆的仙境，既精緻又虛無縹緲，賦予中國藝術的主題以一種新穎的幻想的價值，這正是因為他們對此一無所知。⁵⁵ 長久以來，由於地理隔絕產生的幻想，經過了一代代遠航東方的歐洲畫家們的紀錄，以及外銷畫家繪製的作品，逐漸被打破。對歐洲人來說，當地人筆下的中國圖像無疑是更為真實準確的資料，因此，通過圖像傳達中國資訊逐漸從外國洋畫師轉移到廣州外銷畫家手中。⁵⁶ 在廣州外銷畫家們的不懈努力下，籠罩在 18 世紀中國的面紗在東西方接觸中，逐漸在一幅幅紀實性極強的外銷畫中被揭下，呈現出它本來的樣貌。儘管這種真實是通過西方人的藍眼睛所眺望而來——玻璃畫中的視角本質上是西方贊助者的視角（清代西方人在廣州的活動範圍十分有限）。

總而言之，描繪廣州十三行夷館的廣州玻璃畫，在以圖像的形式將 18、19 世紀廣州十三行的風景呈現給當代觀眾的同時，也補充了文字歷史資料所未曾提及的部分，同時也有助於打破 18、19 世紀歐洲與中國的地理隔絕，將廣州十三行的景觀真實地呈現在西方人面前。

⁵⁴（英）赫德遜撰，王遵仲、張毅譯，《歐洲與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版），頁 1。

⁵⁵ 赫德遜撰，王遵仲、張毅譯：《歐洲與中國》，頁 250。

⁵⁶ 黃麗莎，〈圖像與認知：18-19 世紀廣州外銷畫的知識性內容〉，《裝飾》，（2021 年第 5 期），頁 32。

五、結語

根據以上對清代廣州十三行夷館外銷玻璃畫繪製年代的分析，筆者發現其結果與某些外銷玻璃畫的館藏資料以及學者標註的時間有一定落差。如〈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二〉（圖4），其收藏地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館（PEM）將其年代標註為約1805年的作品⁵⁷，而根據筆者分析，該玻璃畫的所描繪的場景大約為1799至1801年之間。而Thierry Audric 1720-1820在其著作*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中，將〈十三行夷館玻璃畫四〉（圖6）的年代標註為1830年，⁵⁸實際上該作品的描繪的是1779年至1788年之間的場景，其製作時間大約為19世紀末；而〈十三行夷館玻璃畫一〉（圖3）則被標註為1785至1790之間的作品，⁵⁹事實上根據西班牙館的外觀及國旗判斷，該作品不可能繪製於1788年之前。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比較18至19世紀各國進入中國貿易的歷史背景、在十三行建館的具體時間，以及各國國旗樣式的變化，結合1822年廣州十三行大火後街道與建築的改變，對現存6件風景題材的廣州外銷玻璃畫進行了年代分析。研究表明，這些作品所描繪的十三行夷館區景象，細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環境與建築風貌，並提供了創作的時間範圍。

廣州外銷玻璃畫作為一種具有歷史價值的視覺資料，通過外銷畫師筆尖的描繪，不僅將18、19世紀廣州港口與各國建築的壯麗風景呈現在玻璃畫中，同時也帶有強烈的地方烙印。描繪著廣州風光的外銷玻璃畫遠銷歐洲，又穿越百年時光，與當代人重逢，在這場時空的穿行裡，這些外銷作品與歷史的文字交織著，默默訴說著18、19世紀廣州十三行及身處其中的各國行商的境況。

⁵⁷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199.

⁵⁸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199.

⁵⁹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p.199.

參考資料

中文專書

- (明)屈大均,《廣東新語》,(上海:中華書局),1985年。
- (美)保羅·亞當斯撰,袁艷譯,《媒介與傳播地理學》,(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20年。
- (美)馬士著,區中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一六三五—一八三四年》(1-5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
- (美)馬士著,張匯文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
- (英)A.茲納梅沃斯基撰,俞蘅譯,《旗幟插圖百科》,(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英)孔佩特,於毅穎譯,《廣州十三行——中國外銷畫中的外商(1700-19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
- (英)亨特,馮鐵樹,沈正邦譯,《中國番鬼錄——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 (英)蘇立文著,趙瀟譯,《東西方藝術的交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清)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
- 朱小丹,《中國廣州中瑞海上貿易的門戶》,(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年。
- 吳建雍,《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1年。
- 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徐德志等著,《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
- 章文欽,《廣東十三行與早期中西關係》(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年。
- 顧潤清等,《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中文期刊

- 江澄河，〈清代廣州外銷畫的創作形式與題材〉，《文化雜誌》，卷 44（2002 年）。
- 范岱克，任希嬌，〈1760-1843 年廣州外國人居住的商業街〉，《海洋史研究》，（2015 年 02 期），頁 104-123。
- 耿昇，〈17-18 世紀在廣州的法國商人、外交官與十三行行商〉，《暨南史學》，（2014 年），頁 223-240。
- 湯開建，田一言，〈西班牙文手稿阿戈特《广州商馆日记》所反映的清代中期中西贸易和广州十三行史料〉，《清史研究》，（2024 年 5 月，第三期），頁 1-21。
- 黃麗莎，〈圖像與認知：18-19 世紀廣州外銷畫的知識性內容〉，《裝飾》，（2021 年第 5 期），頁 32-34。
- 蔡香玉，〈廣州十三行法語文獻略述〉，《海洋史研究》，（2015 年 3 月），頁 385-407。

碩博士論文

- 王巨新，《清朝前朝涉外法律研究》（山東：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頁 24。

西文資料

-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Paintings, (Princeton : The Pyne Press, Princeton).
- Emily Byrne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00-1800, Diplomatic, Mercantile and Technological Intera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7).
- Museo Marítimo Vasco: Diario de Manuel de Agote, R.631 (año 1789) .
- NAH: Canton 94, 1788.08.24; Museo Marítimo Vasco: Diario de Manuel de Agote, R.631 (año 1789), pp. 92-100.
- Paul A. Van Dyke, 200 Years of Spanish Shipping in Canton and Macao (1640—1840), Revista de Cultura(international edition), N.69, 2022, pp. 79-111.

- Samuel Shaw,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Josiah Quincy, 1847 .
- Thierry Audric, Chinese reverse glass painting 1720-1820, An artist meet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2020).